

当奇点和量子碰撞社会科学

钱旭红

21 世纪的人类发展，俨然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社会”。不确定性本是微观量子世界的本质特征，而现在宏观世界却有更多的表现，并急剧冲击着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自我更新。

现代量子力学认为，宇宙起源于虚无中的量子涨落，起源于真空中爆发的奇点。奇点是一个体积无限小，曲率无限高，温度无限高，密度无限大的存在。它是一切真正的原始起点并包含着未来无限。

2005 年，雷·库兹威尔在《奇点临近：人类超越生物性》一书中，预言 2045 年奇点就会来临，届时人工智能将完全超越人类智能。而奇点之后，如果人的智能能够完全转移到计算机上，死亡将变得毫无意义。与此相关，“奇点大学”“奇点研究所”“奇点峰会”也渐次出现，向世人勾画出发犹如宇宙大爆炸的“奇点宏图”，提醒人类必须严肃面对并深刻思考我们的未来。

明天的世界不是今天的简单延长线，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在世界政治结构、技术结构、文化结构延展中的交错裂变的“新奇点”。传统的社会治理和政治学理论是否能够充分、完整、有效地解释和解决当今世代的国家治理和国际事务，跨学科研究如何在政治学科中形成、成型、发展，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的。

奇点与量子如影相随，可人们通常只将这些视为仅在微观出现的现象或者规律，而不知道大量的当今科学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在不断证明，量子效应不仅仅体现在宇宙大爆炸和宇观世界，更体现在宏观世界，甚至体现在人类的意识和社会中。我们需要超越人为的简单的微观和宏观分界、超越主观和客观的机械割裂，认识到：在经典状态，运用牛顿经典思维；在量子状态，运用量子思维；关注并掌握宏观量子效应、生命的量子效应，是从事研究和应用中的最好策略。

2015 年，亚历山大·温特的《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对量子思维模式与社会科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融合发展，有很好的描述。几个月前，我们以学术方式，在《哲学分析》、*Science* (特刊)上发表“量子思维宣言”的中英文版，就是呼吁，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方法和模式去应对，而量子思维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一个重要的爆发“奇点”。在过去的几百年，我们一直在被动地跟随、追随世界，而当今，我们第一次站在了人类科学技术和思想的前沿，很可能在量子时代站立潮头，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说，过去的一百年，量子学说已经颠覆了自然科学技术和工程；那么将来的一百年，量子思维将可能颠覆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我们正处在奇点时刻，在这突变的前夜。

人不是机器，国家也不是可以格式化的机器人工厂。波粒二象性在人的意识和思考中有充分体现，人就像会行走

的波函数，人脑更接近于量子计算机；社会则是这些行走波函数的相干、退相干和谐振与纠缠；不久的未来，量子社会科学方法将会在经典理论失效的区域大放异彩。如果我们掌握其规律，“无为无不治”，那么，“大制无割、善建不拔、善行无迹”，和“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如何引入量子思维这一颠覆性的思维理念和思维方式去面对传统学科在新形势下的窘境，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大学必须时刻审视当下的工作是否在为无限的未来做足准备，而不是抓着时代的尾巴，被拖拉裹挟向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多学科交叉会聚与多技术跨界融合将成为常态，新学科前沿、新科技领域和新创新形态将不断被催生。学科边界正在被迅速打破，传统的办学优势已受到严峻挑战，我们需要瞄准交叉前沿领域加快布局，将叠加、纠缠、不确定的量子思维、量子逻辑、量子概率引入受制于牛顿经典思维、传统形式逻辑的传统学科，如此才能抢抓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进而努力构建具备中国气象的新文科。

思维是人类隐形的翅膀，人类通过学术创新，完成一次次思维颠覆和突破，带来一次次生产力的释放和文明的跃升。我们需要跨越奇点困境，超越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人工智能的主宰。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重新激活现实主义詹姆逊的“情动”

何卫华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大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三部曲”中，前两部讨论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最后一部《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则是聚焦现实主义。这种回溯的形式别具一格。兴许是因为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过于复杂，而且奥尔巴赫、卢卡奇、伊格尔顿、雷内·韦勒克和罗杰·加洛蒂等重量级理论家都曾将这一问题作为练兵场，詹姆逊才将之留置到最后。

事实上，现实主义是年届九十的詹姆逊长期关注的话题，但此次他并没有纠缠于客观性、典型性和历史性等传统问题，而是另辟蹊径，转而强调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力存在于“叙事冲动”和“场景冲动”的张力之中；他不再选取传统左派文论的视角，而是以“情动”这一文论界当前的最热门话作为分析焦点。

詹姆逊认为，“叙事”和“描写”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叙事”是线性的，与其对应的是故事的“情节”；而“描写”对应的是“场景冲动”，其产生的效果则是“永恒的当下”或“情动”。詹姆逊的前辈卢卡奇对二者同样进行过论述，但追求“总体性”的卢卡奇更看重叙事，因为叙事才能推动故事的前进。对于酷爱对细节进行百科全书式描写的左拉，卢卡奇则认为他不过是矜奇炫博，这类描写和故事中的人物命运没有必然联系，司各特、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等才是现实主义的旗手。然而詹姆逊认为“叙事”和“描写”有同等重要性。在他看来，左拉那种不厌其烦的一一罗列正是“情动”的源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称左拉为对“情动”进行编码的高手。

詹姆逊还重新检视了托尔斯泰、佩雷斯·加尔多斯、乔治·艾略特等作家的作品，对其中的“情动”作挖掘和评析，由此重构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谱系。

其实，早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就提出过“情动的消逝”的著名论点，用以说明梵高的《农民的鞋》和沃霍尔的《钻石灰尘鞋》这两部作品的低下。詹姆逊对“情动”的关注与他对雷蒙·威廉斯的阅读不无关系。在对社会进行“认知测绘”时，威廉斯曾批评弗洛姆关于“社会性格”以

及本尼迪克特关于“文化模式”的说法，认为之前的这些概念过于抽象，无法完整地传达人们对所处时代的鲜活、细腻而独特的体验、感受和情感，因此提出“情感结构”这一概念。詹姆逊关于“情动”的相关论述显然更进一步，有更为复杂的理论效果——“情动”不同于那些被“命名了的情感”，而是处于体验状态的“身体的感觉”，只能用“独特性和强烈度”表示，“叙事”和“场景”则是“情动”得以孕育的温床。

借助“描写”或“场景”，文学成为传达各种“感觉”的重要场所。在“故事”中引入“情动”，是现实主义横空出世的标志，二者间的动态关系决定着现实主义内部的“变奏”。在越来越理性化的时代，在大众越来越沉湎于光怪陆离的图像或形象中时，在理论对“总体化的感觉”进行抓取、概括和抽象时，总有些部分会逃逸，无法被语言捕获，无法被理性完全笼罩，因此，对“情动”的强调既有理论意义，同样有现实意义。通过召回种种仍无法命名的“感觉”，可以丰富和拓展文学批评的疆域，以描画更广阔、完整和更接近真实的现实空间或“总体性”，同时让“人”得到更细致入微、更好和更全面的关照。

十多年前，在杜克大学访学时，同在的朱国华教授约我一道对詹姆逊做过一个访谈，在访谈中，詹姆逊强调自己的兴趣始终是形式和历史间的关系。就此而言，“情动”这次在詹姆逊理论体系中的“回归”，更为全面地说明了资本主义主体性形成、“形式”和历史间的互动及其内部张力问题。由此，詹姆逊不仅完成了自己对现实主义文学谱系的建构，同时还为“情动”最终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凿开了一条大道——现实主义由此被重新激活。此外，从五光十色的大众文化文本到对文学“经典”的聚焦，从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回归到更为坚实的现实主义，从艰深的理论演绎回归到“情动”或身体的感受，或可理解为“后期詹姆逊”思想疆场上的空开始漾起的一丝怀旧气息。（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荷兰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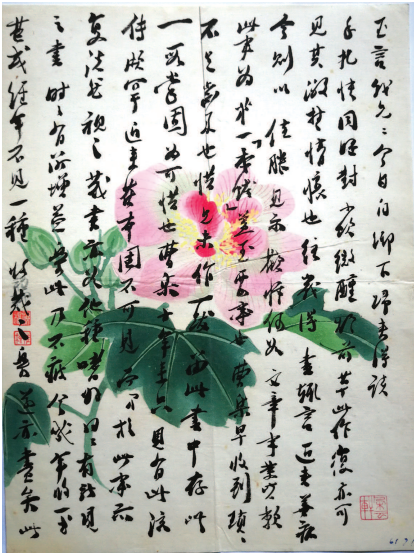
黄裳和他的小说《鸳湖记》

周伦玲

在整理黄裳与父亲周汝昌的通信时，周伦玲发现了黄裳寄给周汝昌的一部分小说《鸳湖记》副本，大约有十万字，上有周汝昌用红笔批改的痕迹。这部撰于 1960 年代初期的明末历史小说，有名士、有美人，据通信可知，小说抄稿也曾寄给明史专家吴晗一份；至 1964 年 9 月，已成二十一万字。



▲黄裳小说《鸳湖记》手稿



▲黄裳致信周汝昌 周汝昌、黄裳合影



1962 年，香港《大公报》陈凡先生约请黄裳撰写一部以晚明史事为题的长篇小说。黄裳心为所动，又畏其难，三思而后还是决心动起来再说，于是他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好友周汝昌。

黄裳与周汝昌曾是天津南开高中的同窗契友——不仅同班兼同屋，而且是知己。周汝昌年长黄裳一岁，所以总是称他为老弟，黄裳则呼周汝昌为兄。周、黄二人志趣略同，都酷爱文艺。那时每日晚饭后，情意悠闲，风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墙子河畔为度，饱领落日归鸟之趣，霞天散绮之奇。二人不光走，当然还有说笑，而话题往往落到“红楼”上。黄裳后来回忆说还记得当时二人谈论“红楼”于墙子河畔，大骂高兰墅的事；而周汝昌，记得创作了一个新字，那就是 redology！

1962 年，正值“红楼”大热，考证文章迭起。彼时，《光明日报》邀约周汝昌撰写“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的文章，其忙得不亦乐乎。得知黄裳欲作小说，就鼓励说：“大抵事在‘动手’，动了以后不愁不有进境；必待‘万事齐备’才动，则恐有终究无此可能之险。”周汝昌还以自己作比，说：“兄之‘丛话’即是好例，原意绝不够‘动手’的条件，差得还远——远极了！可是此‘远’何日能‘近’哉？若非《光明日报》‘打鸭上架’，恐尚不知何年才‘动’，而动动之后，亦始觉非不可先‘小动’也。是以兄力赞胜业，勿忽勿忽。”

周汝昌：“别人我不知，我闻此讯认为此乃一件大事、要事与盛事”

原来黄裳正在设计写一明末历史小说：

每日构思于此，他务都虔，颇有趣。大抵写晚明江南复社诸公居乡种种情状。主要在写钱牧斋、柳如是及张天如、吴梅村故事，而以周延儒复相至杀头为一大关键，其间有名士、有美人，有文选家，有政客，有山人……，总之，有民间疾苦，有政治斗争善恶等，亦有社会生活，内容足够丰富的。问题在下笔，曾设计了几种写法，似传统都有局限，必须新发机抒才行。

黄裳对于自己小说的内容、写法，乃至书名的定夺，都有所交待：“小说不拟写甲申乙酉之顷，因此一段太俗，涉事者太多。在周延儒赐死后即告一结束，然后一跳至清初吴梅村的活动，最后是在嘉兴做《鸳湖曲》，忏悔名场，故书名拟为《鸳湖记》。”黄裳说：“如可能，以后当再写清初政事，就可以找出《丛话》的内容了。”“《丛话》的内容”，指的即是周汝昌撰写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的一组文章，黄裳认为周汝昌文章所写，其实就是清初历史之钩玄索隐也。

周汝昌最兴奋者莫过于黄裳的明清之际的小说写作计划，即回信说：“仅闻此题目已作数日欢喜，万望付之实现，勿徒托空言，令我辈读者虚望屠门而垂涎也”，“尚盼随时告我以进展”。

得到周汝昌的热情赞成，黄裳很感动，7 月 3 日回信道：“近一月中，几全力考虑此事并收集材料，期于下月开始动笔写之。计划颇庞大，写则先从小处写起，照理须有较长之准备，但看来也只有先动起手来，不然终无成期也。兄前曾有此议，极是极是。”

黄裳开始抓紧时间努力写小说，两月间已得万三千言，写到虎丘复社大会，有黄皆令、卞玉京出场，他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那激发出来的灵感铺陈开来，自己感觉非常有趣。他欲寄给周汝昌，“或先寄请一鉴也”。

周汝昌闻知黄裳已开端写小说，且已得万数千字，喜不可支！他说：

别人我不知，我闻此讯认为此乃一件大事、要事与盛事，比什么都觉得味也。务望坚持，点滴积累，兄无能也，但可子弟以精神支持也。

黄裳：“此稿有抄稿两份，寄兄之一份，请即在上面动笔，不必客气”

黄裳小说写得颇畅，过了两天已成万五千字。黄裳平日工作很忙，抽不出时间，只能在星期天闭门写作，让他大费思索。他拟为柳如是“立传”，可是此人资料虽已穷搜广采，但其前期活动及思想仍未能详知。黄裳认为柳如是的确确是一位奇女子，是晚明社会中一个典型人物，值得好好写一写。

黄裳处外留心小说资料的集集，在得知周汝昌即将前往天津市文研所作曹雪芹的学术报告后，即嘱托他赴博物馆寻觅有关王百穀与马湘兰通信手卷与题跋，说这是写小说必不可少之资料。1962 年的国庆节，放假三天。这三

费心思，不知如何落墨方不歪曲古人”。

至 12 月中旬，黄裳小说又成一节，他仍寄呈周汝昌。周汝昌把《鸳湖记》第二部一口气读完，乃觉此节已“渐近自然”，文笔胜前节多矣。首节犹时时不免斧凿痕，此则颇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乐，遂用红笔将首节逐字推敲厝置，自谓颇足供采酌。周汝昌不愧是红学家，他除了指出文字还要力加锤炼，更向黄裳介绍了自己读红楼之心得：

只举最要一点：弟作小说须向“石头”“玉兄”学习，其特点之一即不多作交代语，早早地唯恐读者看不懂、读不懂而时时“书中代表”，不马上下解释，须容读者涵泳自得之，读下文有关处，方恍然有会其意，必如是，乃不浅不薄而有深度、有厚度，该豁达处须豁达，不得处处沾滞……“形容词之类”乃万不得已之“物”，能不用即不用、尽量少用一分即少用一分。常见时下作家专门靠形容词作“艺术”，于是此艺术乃变为廉价而可笑的东西。此乃兄之谬论，然亦平生读红楼之心得，非吾弟亦不轻语人也……

黄裳和周汝昌雁来鱼来，绵绵不断。黄裳马上回复说：

所论小说诸点极确当，何尝不知红楼之妙，亦何尝不欲白描，惜无此本领并无此闲心情。此种小说，如能以一年读书，两年写之，则定较目前所成大妙，然不可得也，只能于办公之余偷闲写数百字耳。所幸者身体强健，自信尚可活三十年，此书只作开手练笔，继或撰李秀成故事或其他题材，必可有所成也。此为壮志，亦只能为兄道之。黄裳盼望周汝昌于暇时批改之，并开玩笑说：“细批不妨，将来可传一周批本也，不太狂而可乎？”

黄裳：“此小说非有四十五万字不能解决”

1963 年开年，黄裳再托周汝昌协助索取天津博物馆所藏柳如是山水卷子的副本，其后带有钱牧斋的一个长长的题跋。黄裳小说诸写即开始于“杨柳因缘”，因此他极需要，说可以此成一章小说也。

春节后的天气，渐渐转暖，黄裳劲头十足。4 月初，黄裳小说已写成六万言。接下来钱牧斋柳如是即将次第登场。到了中下旬，已写到八万字。黄裳打算初步先写个十四五万字，作为小说之上部，再看是否有机会发表。

进入 6 月，小说已成十万字。“近来所写诸情节已渐入紧张之境，此一题材之矛盾冲突，本亦自尖锐，不患无戏剧

* * *

本文看似流水账，实则记录黄裳与周汝昌来往书信涉及小说《鸳湖记》的写作过程，大约止于 1965 年初，之后就不再谈论小说了。在周汝昌 1964 年 12 月 17 日致黄裳的信封背面，不知何人写道：“周汝昌信内问到黄裳小说在香港发表否？”想必这些信函是被查抄后归还者。

黄裳寄给周汝昌的一部分小说副本，大约有十万字，目前保留完好，上面确有周汝昌用红笔批改的痕迹。